

肆、

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看法： 以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改造論」的辯論為中心

一、引言

臺灣在地理上位於地球上最大的陸塊歐亞大陸與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交界之處，位置極具重要性與特殊性，所以，歷史上的臺灣既是漢民族海外移民的最大島嶼，也是近 300 多年來世界強權勢力爭衡的場所，發展過程既一再出現歷史的斷裂性，又呈現文化的多元性。最近百餘年來，臺灣歷史歷經幾個重要的轉捩點，例如 1865 年臺灣建省，劉銘傳（省三，1836-1895）推動新政；1895 年乙未割臺，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臺灣；1920 年代新舊思潮激盪，文化更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光復；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兩岸分治；1987 年戒嚴令廢除，臺灣政經情勢快速變動，邁向民主政治。在上述歷史轉形期中，臺灣與東亞各國，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均有複雜的互動關係。

本文以 1920 年代臺灣知識份子在發行於東京的《臺灣民報》上，所發表的有關中國的現狀與前途之辯論作為主題，分

析 1920 年代這場「中國改造論」的思想內容及其歷史意義。這場辯論之所以值得注意，主要原因在於：當時身處日本統治之下的臺灣知識分子，經由日本而「折射」地關懷中國大陸的發展，屈折地顯示出日本統治時代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關係。

1920 年代是臺灣歷史轉型的一個關鍵年代。經過 20 餘年的武裝抗日運動之後，臺灣人從 1920 年代開始轉向議會鬥爭。1918 年，臺灣留日學生在東京組成「六三撤廢期成同盟會」，1920 年該會創辦《臺灣青年》月刊，1922 年易名為《臺灣》，1922 年再度易名為《臺灣民報》（半月刊，後來改為旬刊）。1927 年 7 月開始，《臺灣民報》獲准在臺灣發行。1921 年 11 月，臺灣文化協會創立，林獻堂（1881-1956）出任該會之總理。1923 年，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經歷了創立，被日本殖民政府打壓、查禁，並再度建立的過程。¹1926 年，臺灣文化協會發生內部鬥爭，傾向社會主義的人士在新的文化協會中佔多數，積極動員群眾，發表政治演說，鼓動風潮，造成時勢。1930 年 10 月，臺灣發生霧社事件。本文所探討的 1920 年代發生於《臺灣民報》的這場辯論，既關懷中國前途，又是當時臺灣內部各種情勢的反映，²深具歷史意義。

¹ 參考吳三連、蔡培火等：《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71），頁 202-280。

² 誠如王曉波所說，這場「中國改造論」的論戰「並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的放矢，『的』就是『文化協會』的路線，究竟要走民族鬥爭還是要走階級鬥爭的問題」，其說甚是。見王曉波：〈蔣渭水的思想與實踐——《蔣渭水全集》編序〉，收入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臺北：海峽學

我們再放寬視野來看，20 世紀的 20 年代，也是世界政治風雲變幻，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時代。在歐洲方面，莫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於 1922 年 10 月在義大利組成政府，11 月獲得獨裁權力，1922 年 12 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成立（USSR，簡稱「蘇聯」）成立。1923 年 11 月，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在德國興起。1924 年 1 月蘇聯領袖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逝世，1926 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打倒托派。1929 年 10 月，美國證券市場崩潰，從 1930 年開始歐美國家發生經濟大恐慌。1920 年代的西方世界獨裁體制逐漸興起，經濟趨於蕭條，確實是西方歷史動盪的 10 年。在東亞方面，1920 年代也是風雷激盪的歲月。從 1919 年五四運動起至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為止，1920 年代的中國是一段憂患的 10 年。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於上海。1922 年 4 月發生一次直奉戰爭，軍閥混戰，民不聊生，1923 年 2 月孫中山（1866-1925）在廣州就任大總統，組成第三次廣東政府。同年 3 月，中國要求日本廢除〈二十一條要求〉，日本悍然拒絕。5 月至 8 月，中日之間因中國收回旅順事件發生衝突，中國各地掀起抵制日貨運動。同年 12 月，中國因為關稅問題而在全國各地掀起反帝國主義運動。1924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開始進行第一次國共合作。1925 年 3 月 12 日，廣東大元帥府大元帥孫中山逝世於北京。1926 年 7 月 7 日，蔣中正（1887-1975）出任國民革

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1928年臺灣共產黨成立於上海。1928年5月，日本侵略山東濟南；6月，日本人暗殺張作霖（雨亭，1873-1928）。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入北京城，北伐成功，完成中國初步的統一。北伐完成後，中國知識份子苦心思考「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問題，意見分歧，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爆發，³與20年代的歷史背景有其密切之關係。

20世紀20年代的臺灣知識份子，正是站在中國與世界歷史巨變的時代裡，為文爭辯中國社會的現況及其未來走向。他們的辯論觸及諸多問題，例如中國的未來應走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道路？應進求民族解放或走階級解放？蘇聯模式是否適合中國？諸如此類大問題，均有其時代之意義，值得深入探索。

二、「中國改造論」辯論的歷史背景與參與者

這場「中國改造論」的辯論，始於1926年8月22日出刊的《臺灣民報》第119期，陳逢源（1893-1982）在該期發表〈最近之感想（一）〉開始，⁴終於1927年2月6日《臺灣民報》

³ 關於中國社會史論戰，參看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的起因和內容〉（臺北：中華雜誌社，1965）。

⁴ 陳逢源自稱他發表「中國改造論」，實受到日本人田崎仁義的影響，見陳逢源：〈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第120號（1926年8月29日），頁10。陳逢源所讀的書是：田崎仁義（1880-？）著：《支那改造論：附日支共榮と文化方策》（東京：同文館，1926）。其實，早在1926年田崎仁義發表《支那改造論》這部書之前，內田良平（1874-？）

第 143 期所刊許乃昌 (1906-1975) 致陳逢源的公開信爲止，⁵在四個月間刊出往返論辯文章 17 篇 (其中數篇係連載刊出)，撰文者雖然只有陳逢源、許乃昌及蔡孝乾 (1908-1982) 等三人，但是，他們往返論辯的內容却觸及諸多重要問題，使這場小辯論深具歷史意義。這場辯論的歷史背景及其重要性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觀察：

(1) 這場辯論發生於中日臺三方密切互動的歷史動盪期：1920 年代中國的政治，是以國民革命爲主軸而展開的國共合作的時代。這個時代中國的社會與經濟也經歷巨大的變化。首先是中國人口的快速增加與都市化的發展。19 世紀中葉中國人口據估計約有 4 億，至 1933 年推估已增加至 5 億左右。沿

已發表《支那改造論》(東京：井上藤三郎黑龍會藏版，1911)一書，佐佐木到一(1886-1955)在 1927 年也刊印《支那陸軍改造論》(東京：行地社出版部，1927)一書，討論中國「改造」之方向。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於 1914 年發表〈支那論〉，在 1924 年又發表〈新支那論〉兩篇文章，討論中國之發展前景，這兩篇論文均收入，《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44)。20 世紀初期，中國局勢動盪，日本知識份子提出諸多對中國前途之看法，他們的意見均與當時中日關係及國際局勢互有關係，值得加以研究。

⁵ 「中國改造論」辯論之後，1927 年(昭和 2 年)9 月 13 日及 18 日，臺灣民眾黨臺南支部在臺南公會堂舉辦兩次「臺灣社會改造觀」的演講會，可以視為「中國改造論」辯論在臺灣問題上的延續發展。「臺灣社會改造觀」的演講者包括韓石泉、王受祿、陳逢源、盧丙丁、謝春木、彭華英、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參看：《臺灣民報》第 176 號(1927 年 10 月 2 日)，177 號(1927 年 10 月 9 日)，178 號(1927 年 10 月 16 日)，179 號(1927 年 10 月 23 日)，180 號(1927 年 10 月 30 日)，181 號(1927 年 11 月 6 日)，182 號(1927 年 11 月 13 日)，183 號(1927 年 11 月 20 日)，184 號(1927 年 11 月 27 日)。

海地區都市的人口更是快速增加。據估計，1920年代中國的都市人口約有5,000餘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的10%。其次，1920年代中國國內的棉紡織業快速成長，已可以取代國外進口的棉製品。最後，1920年代新聞媒體也快速增加，使資訊流通更加容易。據估計，全中國報紙在1925年已達400種，雜誌至1927年則增至1,826種。⁶

在上述政治、經濟、社會巨變的歷史背景裡，中國知識份子深受1917年俄國共產革命成功的鼓舞而對馬克思主義抱有相當的嚮往，曾在1923至1927年之間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蔣夢麟（孟鄰，1886-1964），在他的回憶錄《西潮》提出第一手的證言，他說：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的思想界，自由風氣非常濃厚，無論是研究社會問題或社會原理，總使慣於思索的人們難於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們趨向行動。戰後歐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這種氣氛下介紹進來的。各式各樣的「主義」都在中國活躍一時。大體而論，知識份子大都循著西方民主途徑前進，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鼓舞而嚮往馬克思主義。《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辭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職務，成為中國共

⁶ 以上參考狹間直樹：〈國民革命の舞臺としての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收入狹間直樹編：《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東京：汲古書院，1995），頁3-32。

⁷ 蔣夢麟：《西潮》（臺北：世界書局，1978），頁129。

產運動的領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也促使知識份子普遍同情俄國革命。第三國際於一九二三年派越飛到北京與中國知識份子接觸。某晚，北京擷英飯店有一次歡迎越飛的宴會。蔡校長於席中致歡迎詞時說：「俄國革命已經予中國的革命運動極大的鼓勵。」

正如蔣夢麟的觀察，192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思考中國的前途時，對俄國的革命經驗已經付予相當的注意。「中國改造論」辯論的參加者之一蔡孝乾，正是這種臺灣左派知識青年中的一份子。

在 1920 年代，中國留日學生人數激增，統計資料顯示：1928 年（民國 17 年，昭和 3 年）中國留日學生高達 2,480 人。⁸中國留日學生中以攻讀社會科學者佔最多數，例如 1918-1921 年的統計顯示：中國留日學生攻讀學科以社會科學佔 24.84% 為最多，其次是工程學科，佔 23.53%。⁹留日學生歸國後，在中國各方面的影響力也至為可觀，例如 1923 年列名於英人 H. G. W. Woodhead 所編的 *The China Year Book* 的名人錄的人物之留學國別，就以日本為最多，佔 29.5%，其次才是美國，佔 12.9%。¹⁰造成留日學生激增的原因，主要是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之

⁸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頁 322，〈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前表〉1928 年條。

⁹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5), p. 512, Table 11.

¹⁰ Y. C. Wang, *Op. cit.*, p. 177, Table 5.

後，痛定思痛，轉而以日為師，誠如梁啟超（任公，1873-1929）所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¹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關係密切的 1920 年代，也正是日本的大正時代（1912-1926），日本乘明治維新成功之後，睥睨亞洲，顧盼自雄，最鄙視中國的時代。¹²1915 年 1 月 8 日日本對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正是這種因對中國的鄙視而產生的政治野心的表現。在日本侵華野心日甚一日之際，1928 年日本出兵山東濟南，激起中國留日學生之義憤，組成「中華留日反帝同盟」，發行《反帝戰線》，民族主義日益激昂，向日本政府示威，1931 年九一八事件後，留日學生組成「中華各界反日大同盟」，留日學生幾乎全部回到中國。¹³

在中日關係緊張的 1920 年代，臺灣留日知識份子也受到感染。1920 年 1 月，臺灣留日學生在東京組成新民會，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臺灣的統治，1921 年 1 月，新民會向日本國會請願，要求在臺灣設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議會。¹⁴臺灣學生身居日本，當然關心中日關係，但是，作為中國的「棄地遺民」，¹⁵他們更關心中國國內局勢的發展與前途。《臺灣民報》的「中

¹¹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 年 2 月臺 2 版），頁 1。

¹² 關於大正時代的中日關係，參考山根幸夫：《大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國のあいだ》（東京：研文出版，1998）。

¹³ 參考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 297-301。

¹⁴ 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 320。

¹⁵ 十九世紀末的臺灣富商李春生（1838-1924）在乙未割臺之後，應日本殖民政府之邀赴日訪問，回臺後撰寫《東遊六十四日隨筆》（福華：美華書

國改造論」辯論，正是產生於上述中日臺三邊密切互動的歷史背景之中。

(2) 這場辯論的參與者是當時臺灣具有其代表性的人物：首先於1926年8月22日在《臺灣民報》發表〈最近之感想(一)〉的陳逢源(1893-1982)，是1920年代臺灣的菁英。¹⁶陳逢源原籍臺南市，是地主出身，對臺灣土地制度與經濟問題頗有研究，¹⁷舊學根底甚佳，能寫漢詩。¹⁸1923年2月，陳

局，1896)，敘述在日本參訪時之所見所聞所思，書中三度以「棄地遺民」（頁9、51、82）自況。「棄地遺民」一語頗可形容日據時代的臺灣知識份子。關於李春生的研究，參考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臺北：正中書局，1995）。

¹⁶ 關於陳逢源生平，參看（1）陳逢源先生治喪委員會編：《陳逢源先生哀榮錄》（臺北：陳逢源先生治喪委員會，1982）；（2）張炎憲：〈陳逢源（1893-1982）浪漫之情與財經之才〉，載於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一冊）》（臺北：自立晚報，1987）；（3）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紀錄〉，載於黃富三、陳珮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臺北：林本源基金會，1991）；（4）龔顯宗：〈陳逢源福慧雙修〉，《臺灣文學家列傳》（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5）謝國興：《陳逢源（1893-1982）：亦儒亦商亦風流》（臺北：允晨文化，2002）。

¹⁷ 參看（1）陳逢源：《臺灣經濟問題の特質と批評》（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3）；（2）陳逢源：《外地米統治問題》（臺北：臺灣經濟研究所，1934）；（3）陳逢源：《臺灣銀行券統一論》（臺北：臺灣經濟研究所，1935）；（4）陳逢源：《新臺灣經濟論》（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5）陳逢源：《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臺北：萬出版社，1944）；（6）陳逢源：〈臺灣土地制度と小作問題〉，收入金關丈夫等著：《臺灣文化論叢（第一輯）》（臺北：南天書局，1995）。

¹⁸ 參看（1）陳逢源：《雨窗墨滴》（臺北：臺灣藝術社，1942）；（2）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臺北：合源印刷有限公司承印，1980），並參考廖一瑾：〈溪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陳逢源先生與二十世紀臺灣古典詩壇〉：《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1994年6月），頁75-110；李貞瑤：《陳

逢源與蔡培火、蔣渭水等人抵達東京，籌備重建在臺灣被日本殖民政府禁止成立的「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1923年12月16日，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搜查並逮捕與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有關的人物，陳逢源亦被捕。¹⁹陳逢源是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眾黨的重要成員，他的諸多論點在相當程度之內可以代表當時臺灣資產階級的立場。

在這場論戰中，爲文反駁陳逢源的是許乃昌²⁰與蔡孝乾。許蔡二人的論點傾向社會主義，誠如盧修一（1941-1998）所說，在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改組以前的這場論戰中，許蔡二人文化代表社會主義立場，正與陳逢源的資本主義立場，構成對比。²¹許蔡二人之中，蔡孝乾更具有時代的代表性。蔡孝乾是彰化花壇鄉人，他是臺灣共產黨人中進入江西蘇區，並於1934年10月參加中共長征的知識份子。蔡孝乾曾回憶他從臺灣進入大陸的經過說：²²

逢源之漢詩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¹⁹ 參考蔡培火等：《臺灣民族運動史》，第五章，尤其是頁202-209；參考王曉波：〈治警事件的兩志士—敬悼陳逢源與蔡培火先生〉，《中華雜誌》第235期（1983年2月）。

²⁰ 關於許乃昌的思想，參看：邱士杰：〈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批判與再造》，20期（2005年6月），頁26-38；21期（2005年7月），頁26-40。

²¹ 參考盧修一：《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1928-1932）》（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1990），頁43-44。

²² 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紀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頁3。

1928年8月，因上海「臺共事件」發生，惟恐波及臺灣島內組織，經會議決定，當將幾個重要幹部撤離臺灣。八月下旬的一個夜晚，我和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在北部後龍港秘密乘船逃出臺灣，來到漳州，寄寓於城內東半後街枕頭巷。為了生活和掩護，我先後在石碼中學和龍溪女子中學教書。

蔡孝乾在《臺灣民報》為文反駁陳逢源，是在1926年12月5日，是他進入大陸的一年八個月前。

從以上這兩項背景考察，我們就可以肯定1920年代《臺灣民報》的這一場「中國改造論」辯論，在歷史上實有相當的代表意義。

三、議題(一):資本主義道路或是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改造論」的論戰觸及許多問題，其中較具歷史意義的議題有二，第一個議題是：中國應走資本主義道路或是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問題是陳逢源的「我的中國改造論」的主要論旨。我們首先從第一個議題開始探討。

(1) 陳許蔡三人的論點與爭辯：

陳逢源首先批判當時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後藤新平(1857-1929)對臺灣所採取的是「侵略政策」、「榨取政策」、

「愚民政策」。²³他接著主張，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破除舊的封建經濟。他認為，1920年代的中國之所以未能走向資本主義，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中國的社會組織雖有一部份已經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例如上海、漢口等工業地區），但是，中國大部分地區仍然處於封建經濟的狀態。現在割據各省的督軍，與歷史上的諸侯並無二致。中國各地的工商業大部分規模都很小，尤其是工業尚未脫離手工業階段，而且，中國因為受列強帝國主義的摧殘，所以資本主義不發達。舉例言之，中國海關由列強管理，所以不能保護國內幼稚的工業。列強在中國又掌握鐵道、礦山、航海等利權，所以這些實業也難以成長。²⁴

陳逢源主張：中國要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必須促使工商階級茁壯，使工商階級的財力逐漸增進，團結力逐漸組織，才能打破軍閥與封建制度。²⁵

其次，陳逢源主張：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如果只由個人性的財力經營實業，必不敵外國大資本。因此，中國的實業家必須推動股份公司制度，由社會聚集小資本為大資本，才能振興商工業。他說：「中國人所組織的股份公司，大都成績不良，卻沒有好結果。這些原因不一，大概是一面為辦事人的

²³ 芳園：〈最近之感想（一）〉，《臺灣民報》第119號（1926年8月22日），頁11。

²⁴ 芳園：〈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第120號（1926年8月29日），頁8-9，並參考陳逢源：《新支那素描》（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9）。

²⁵ 同上文，頁9。

利己心（民族性的缺陷），一面為大組織的訓練不足之故。如果中國人的股份公司永久不得發達，第一是表示中國人沒有奉公的精神（股份公司既是個團體，便是一種公共的事業了），第二表示中國人沒有經營大組織的資格，如此，中國人不配說什麼社會主義。我們確信中國人的股份公司的成功，便是中國資本主義的成功了」。²⁶

陳逢源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中國改造論」一經提出，立即受許乃昌的駁斥。許乃昌反駁陳逢源，他指出：中國資本主義之所以未能茁壯，主要原因不在於陳逢源所說的軍閥封建勢力，而是因為軍閥實際上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²⁷他強調，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已經實際上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只有走「國民革命」的道路才能改造中國。

那麼，什麼是「國民革命」呢？許乃昌指出：「國民革命」有兩大方向：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具——軍閥與官僚買辦階級。²⁸他認為：國民革命可以採取兩種方向，第一種方向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對於帝國主義只進行局部抵抗，第二種方向是無產階級領導，致力於全面打倒帝國主義。²⁹他認為，無產階級才是中國國民革命的指導者，因

²⁶ 同上文，頁9。

²⁷ 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第126號（1926年10月10日），頁12。

²⁸ 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臺灣民報》第127號（1926年10月17日），頁10。

²⁹ 同上文，頁12。

爲中國資產階級有其反動性，他宣稱：

中國的資產階級，僅僅是妥協和反動而已。而只有中國的無產階級會徹底去爭奪中國民眾的利益，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壓倒軍閥官僚們的勢力」才會整個的「打破軍閥——封建制度」，只有中國無產階級能擔任改造中國的歷史的革命！

許乃昌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性質之不同，斷定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

陳逢源針對許乃昌上述言論有所回應，但因內容涉及「中國的特殊性」以及「民族解放或階級解放優先」等問題，我們將於下節再討論。

蔡孝乾在反駁陳逢源的文章中，一開始就非常敏銳的指出：陳逢源的錯誤在於僅就中國論中國，而未能將中國置於世界的脈絡中加以考量，他說：「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中國問題即世界問題之一」。³⁰從這個宏觀的角度切入，蔡孝乾認爲現階段既然中國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的控制，就不可能發展成爲資本主義國家。³¹

蔡孝乾的主張可以歸納成以下三項：「(一) 中國的封建制

³⁰ 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第134號（1926年12月5日），頁10。

³¹ 同上文，頁11。

度已漸漸被國際資本主義所破壞。(二)中國本身不能向資本主義這條路跑去，而無產階級已漸漸向社會主義的路上跑去了。(三)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才是工商(業)階級的勃興，股份公司發達的要素。」³²而掙脫國際資本主義對中國之控制的方法如何呢？蔡孝乾主張：中國改造的關鍵在於打破現有的生產關係，也就是中國必須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2) 與中國知識份子看法的比較

如果我們將上述三位臺灣知識份子關於「中國改造論」的爭論意見，取而與 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關於同樣問題的論點互作比較，我們就發現：臺灣知識份子思考中國之前途，基本上將中國當作某種「概念」，思考社會進化的各種階段在中國的適用性；但身處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思考中國前途時，則常將中國當作「實體」，因此，他們較能考慮中國發展的複雜性。讓我們從《申報月刊》中的言論說起。

上海《申報月刊》在 1933 年 7 月創刊週年時，以「中國現代化問題號」作為特輯，向社會知名人士邀約稿件，邀稿的問題有二：一是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及其障礙，二是中國現代化的方式，結果收到短論 10 篇及專論 16 篇。《申報月刊》這次專輯的作者包括陶孟和(1887-1960)、樊仲雲(1899-?)、吳

³² 同上文，頁 12。

澤霖(1898-1990)、周憲文(1907-1989)、鄭學稼(1906-1987)、金仲華(1907-1968)、吳覺農(1897-1989)等知名人士。

從各篇文章內容看來,《申報月刊》這次專輯的作者們很少對中國應走資本主義或社會道路,採取非此即彼的絕對立場,大多數作者多半主張,中國應採行受到節制的資本主義。已故北大教授羅榮渠(1927-1996)統計指出:「完全贊成走私人資本主義道路即個人主義道路的,只有一篇;傾向於社會主義方式的,約有5篇;認為應兼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之長,或主張採取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形式,即主張混合方式的,約有9篇;未正面回答採取何種方式而強調或專論工業化、產業革命、國民經濟改造為先決條件的文章也有5篇之多;沒有明確回答問題或討論其他問題的,有3篇。雖然論者對現代化缺乏統一認識,但認為應『著重於經濟之改造與生產力提高』,以及類似的論文,在討論中明顯占上風。」³³羅榮渠的歸納大致可以說明《申報月刊》這次專輯中,諸多作者對中國前途的看法的大致趨勢。30年代大陸的知識份子,身處北伐完成而日寇侵華前夕的中國³⁴,他們較能體認中國的複雜性,因此,他們提出的看法與關心中國前途的臺灣知識份子的意見

³³ 羅榮渠:〈中國近百年來現代化思潮演變的反思(代序)〉,收入羅榮渠編:《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1-38,引文見頁14-15。

³⁴ 關於1930年代的國民黨,參考:Lloyd E. Eastman, "The Kuomintang in the 1930s," in Charlotte Fruth ed., *The Limit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91-212.

比較而言，更爲具體而多樣，其中以董之學的意見最具代表性，董之學說：³⁵

中國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社會，可以不需要社會主義革命；他也不是單純的封建主義社會，所以不需要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化；他僅是界於兩者中間的複式社會，很可以而且需要採取非資本主義的路線。

在這裡我們應當認識的，切不要把中國的經濟問題看做簡單的技術問題或經濟政策的問題。以為有了技術，有了經濟政策，有了資本，中國的整個經濟都有了辦法了。我的意見，恰和這個相反。關於如何發展生產的問題，我認為主要的還是要從政治上來想辦法，來想出根本的徹底的辦法。如何取得與使用技術，如何籌集與分配資本，倒是比較次要的問題。

董之學在以上這一段話中，首先指出中國社會是介於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之間的複式社會；其次，他指出在政治力較經濟力優先而且更有影響力。

比較觀之，參與《臺灣民報》「中國改造論」辯論的三位臺籍知識份子，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基本上視爲對立的兩極，並在這種脈絡中思考中國的前途。其中，陳逢源的文章雖未明言，但是含有通過資本主義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涵義。

³⁵ 董之學：〈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原載《申報月刊》，第2卷第7號（1933年7月），收入羅榮渠編：前引書，頁239-248，引文見頁246。

但是，《申報月刊》的許多作者，則較能注意中國社會的複雜性，難以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簡單加以概括。而且，他們他們較能注意到中國改造過程中，政治支配力的優先性。

四、議題（二）：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孰先？

1920年代的這場「中國改造論」所觸及的第二個問題是：為求中國之改造，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孰先？這個問題深具意義，而且可以視為日據時代臺灣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現實狀況在意識型態上的反映。

陳逢源在提倡中國改造之大方向在於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也大力提倡中國民族主義，認為民族主義是救國之藥方。陳逢源說：³⁶

由世界的現狀看來，沒有先解放民族，哪裡還會得解放階級？沒有先造成統一的國家，哪裡還會得打倒列強的帝國主義？然而信奉共產主義的人們，不認清改造的方法要有順序。〔…〕革命前的俄國，歷來是世界中的一強國，不像中國這些四分五裂的樣子，已成為列強的次殖民地。

³⁶ 芳園：〈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七）〉，《臺灣民報》第137號（1926年12月26日），頁11-12，引文見頁11。

陳逢源主張在中國民族主義尚未全面壯大之前，具有「超國家思想的共產主義」³⁷對國家會有所傷害，應束諸高閣。

陳逢源也在民族主義的脈絡中解讀北伐的歷史意義，他說：³⁸

照我的所見，中國這回北伐軍的勝利，一面是革命軍隊裡頭的革命精神的發現，一面是全國民的民族精神通一致的聲援的結果。我以為這斷不是共產主義的勝利，分明是國民主義的勝利無疑了。中國革命軍如果繼續地振興全國民的民族精神，則中國的統一事業，定規懸於他們之手。萬一，他們若跑入錯途，樹立赤旗起來，國家又得統一，無產階級亦不能解決，確是百害無一利了。

陳逢源認為北伐所代表的是「國民主義」³⁹的勝利。他認為無產階級對中國問題的解決「百害無一利」。

許乃昌反駁陳逢源的論點，就從階級的解放先於民族的解放這個立場切入。許乃昌首先指出，1920年代的中國處於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社會的階段，這是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不能完全適用俄國模式或日本明治維新的模式。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初期，正值世界帝國主義昂揚的時代，中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及資產階級，都深深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必須聯合全

³⁷ 同上註。

³⁸ 同上文，頁12。

世界無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的勢力。⁴⁰

蔡孝乾的意見則較許乃昌更進一步，他認為：1920年代的中國比革命前的俄羅斯更壞，無產階級所受的痛苦更甚，外國帝國主義的榨取和軍閥的剝削，使中國無產階級陷於水火之中。所以，中國不應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中國的改造只能寄望於生產關係的改造，也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蔡孝乾總結他的意見說：⁴¹

今後中國本身不能向資本主義這條路跑去，倘若農工商各階級的勢力多少能夠增長，所積蓄的「財」，也敵不上國際資本主義的蠶食。

中國全民族的解放，須待社會主義的實現，新中國的改造須待無產階級的勢力。

總之，蔡孝乾與許乃昌都主張就 1920 年代中國狀況而言，民族的解放只能以階級的解放為其前提。

如果我們將《臺灣民報》「中國改造論」所涉及的「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孰先？」這個問題，與青年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論「解放」的意見略加比較，就可以看出雙方論

³⁹ 在陳逢源的用法中，「國民主義」指 nationalism，即民族主義。

⁴⁰ 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臺灣民報》第 129 號（1926 年 10 月 31 日），頁 9。

⁴¹ 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第 134 號（1926 年 12 月 5 日），頁 10-13，引文見頁 13。

述的歷史脈路的差異。馬克思曾論法國與德國的差異說：⁴²

在法國，只要有點什麼，就能佔有一切；在德國，只有一無所有，才不致失掉一切。在法國，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礎，在德國，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條件。在法國，全部自由應該由逐步解放的現實過程產生；在德國，確應該由這種逐步過程的不可能性產生。在法國，人民中的每個階級都是政治的理想主義者，他首先並不感到自己是個特殊階級，而是整個社會需要的代表。

在這一段論述中，馬克思將「解放」的可能性放在「部分／全體」以及「特殊／普遍」的脈絡中思考。

但是，1920年代這三位臺籍知識份子將「中國之改造」這個問題，放在「民族／階級解放」的脈絡中考量，雙方考慮問題的切入點顯然不同。這種切入點的差異，主要原因仍是決定於三位參與論辯的臺灣知識份子身處的日據時代臺灣的特殊政經結構。矢內原忠雄（1893-1961）的研究告訴我們：日本佔領臺灣以後，透過林野調查與整理、森林開發事業的推展、度量衡與貨幣制度的建立等手段，而逐漸將臺灣加以資本主義化。在臺灣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日本資本逐漸取得獨占之地位，尤其是在糖業、電力、林業、鐵路等方面更是如此。資本

⁴²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收入《馬克斯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一卷，引文見頁13。

主義化使臺灣社會中的階級關係，由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關係轉變為近代的資本主義的關係；而且因為殖民者日本人與臺灣人及原住民一起生活在臺灣，所以，臺灣社會的階級關係就與民族的對立互相交錯而且互相競爭，出現了殖民地特有的複雜狀態。大體言之，官員與公務員、資本家及其從屬人員（如公司職員、銀行員等）均由日本人獨占；在臺灣的日本人又有在日本國內的政府及大資本家的強權為其後盾。農民與勞動階級則大部分是臺灣人。至於中產工商階級，則日本人與臺灣人互相競爭。在自由職業領域，則兩者並立，臺灣人實力也頗為堅強。但是，因為日本人獨占總督府及大資本家的企業，所以在政治及經濟方面成為臺灣的支配者。農民及勞動者階級是臺灣人的努力，日本人在這一個階級內的地位就很微弱。中產階級工商業及自由職業階級雖為日本人與臺灣人的並立競爭，但既屬競爭，則日本人自然依附於日本政府及大資本家，同樣地，臺灣人則與農工階級合流。在日據時代的臺灣，日本人對臺灣人的民族對立，同時也是政治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並且也是資本家對農民勞動者的階級對立。⁴³

矢內原忠雄是 20 世紀日本很有良心的經濟學者，1937 年因為批判日本侵華戰爭而從東京大學去職，戰後曾出任東京大學校長，他所指出的日據時代臺灣的之「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辯證統一，實在是一針見血，完全切中處於日本帝國

⁴³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

主義之下的臺灣政經情勢的大經大脈。

由於日據時代臺灣政經現實狀況中「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合而為一，所以，日據時代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即使放棄民族認同，也無法完全融入日本文化。正如吳文星（1947-）所說，日據時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始終欠缺自主性，其活動和發展全然受到殖民體致的束縛和侷限，此誠然是近代臺灣社會發展的致命傷」。⁴⁴我們可以推論，身處日據時代臺灣的特殊時空條件下的陳逢源、許乃昌與蔡孝乾，思考中國改造之問題時，特別集中焦點在「民族解放或階級解放優先」這個問題，實有其特殊於日據時代臺灣的歷史背景。

五、結論

對於包括臺灣在內的東亞各地而言，中國實在是一個巨大的「他者」（the “other”）。東亞周邊地域的領導人或知識份子思考本地之問題，很難跳脫中國這個巨大的「他者」的身影，就臺灣而言更是如此。本文以 1920 年代發行於日本東京唯一的臺灣人言論媒體《臺灣民報》的「中國改造論」辯論作為中心，探討陳逢源、許乃昌、蔡孝乾等三位臺籍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意見。這場辯論只不過是 1920 年代歷史巨變的大時代

⁴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 377。

潮流中的小點滴而已，但是，從具有代表性的小點滴之中，我們也常能檢測時代潮流的大方向。

1920年代是臺灣知識份子走過從「啓蒙」到「解放」的過程的關鍵年代。⁴⁵陳逢源等三位臺籍人士，爭辯中國的前途時所觸及的主要有兩個問題：第一是中國應走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道路；第二是在改造中國的過程中，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何者為先？陳逢源主張中國應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且應大力提高民族主義，作為救國之良藥。許乃昌與蔡孝乾則主張中國應走社會主義道路。以無產階級的解放破除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從而完成全民族的解放。辯論雙方立場不同，旗幟互異，結論形同水火。

但是，這三位臺灣精英的論點都有其異中之同。他們論辯中國的現狀及其前途時，都傾向於將中國作為概念，⁴⁶而不是將中國作為實體，因此，他們的言論與當時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言論比較之下，常有「理論先於實況」的思考傾向，以致較少注意當時中國社會的複雜性與多面性。他們對中國政治的

⁴⁵ 參考陳昭瑛：〈啟蒙、解放與傳統：論二〇年代臺灣知識份子的文化省思〉，收入氏著：《臺灣與傳統文化》（臺北：臺灣書店，1999），頁123-228。

⁴⁶ 舉例言之，葉榮鐘（1900-1956）曾回憶他小時候經由長輩口中所獲得的對「唐山」（中國大陸）的印象就是「唐山山長長」，見葉榮鐘：《小屋大車集》（臺中：中央書局，1977），頁24。日據時代臺灣人在日本人殖民統治的壓迫之下，對大陸原鄉充滿渴望孺慕之情，但這種對大陸的「想像」常常只是將大陸視為「概念」，因為未能親履親證中華大地，所以缺乏實體感。參看黃俊傑：〈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大陸經驗：「祖國意識」的形成、內涵及其轉變〉，收入本書第3章。

詭譎與深沉，更是諱莫如深，甚至一無所知。其實，對中國大陸政治實況之無知，正是多數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普遍現象，不僅以在《臺灣民報》寫文章的這三位知識份子為然。舉例言之，1925年（大正14年）中國大陸有人提倡中國與日本合組「日華攻守同盟」，《臺灣民報》對於這條消息大感興奮，特別加以報導，期待甚深。⁴⁷日據時代臺灣作家吳濁流（1900-1976）曾回憶小時候聽祖父講中日抗戰故事後的心情說：「臺灣人的心底，存在者『漢』這個美麗而又偉大的祖國」。⁴⁸日據時代臺灣人看到日本侵華戰爭中，中國節節敗退，感嘆「平生暗淚故山河」（陳炘所賦詩句），楊達（1905-1985）在1944年12月演出《怒吼吧！中國》話劇以宣洩情感。⁴⁹從《臺灣民報》「中國改造論」的辯論中，我們得到的歷史啓示就是：臺灣人出於民族情懷的不能自己之情而關心中國大陸的前途，這是本於同文同種的文化認同的情操，正如1911年2月梁啟超（卓如，1873-1923）應臺灣民間領袖林獻堂（1881-1956）之邀來臺訪問時，所賦的詩句：「破碎山河雖料得，艱難兄弟

⁴⁷ 《臺灣民報》第61號（1925年7月19日），頁8。

⁴⁸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39。

⁴⁹ 巫永福：〈三月十一日懷念陳炘先生〉，《臺灣文藝》，第105期（1987年5-6月），頁83。關於陳炘的生平與遇害，參考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楊達改編俄國作家 Tolechakov（1892-1939）在1926年創作的劇本，題為《怒吼吧！中國》，日文原題《吼える支那》（臺北：盛興出版部，1944年，昭和19年），中譯本刊於《大地文學》第2期（1982年3月），頁149-197，收入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1卷·戲劇卷（上）（臺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年），頁109-216。

自相親」，也正如巫永福在抗戰時期所寫〈祖國〉一詩中所說：「夢見的，在書本上看見的祖國」，⁵⁰這是人間最高貴的美德。但是，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盲點在於僅將中國當作一種抽象的概念，而不是視為一種具體的存在，他們忽略了大陸固然是他們文化的故國，但是禹域二分，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客觀情境之下，大陸卻是他們的政治的異鄉。因此，他們有時過度美化或醜化對大陸的「想像」，而未能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複雜性、整體性與多面性。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思考大陸問題所呈現的盲點，對於今日臺灣與大陸的互動實具有深刻的啓示意義。

其次，日據時代三位臺籍知識份子之所以關心中國的「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孰先」之問題，可能與他們身處於日據時代臺灣之「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合一的特殊狀況有關。他們所發表的有關中國前途的諸多言論，可以視為當時臺灣特殊政經現實情境在思想上的反映。我們可以說，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這個巨大的「他者」的種種思考，常常乘載著他們自身處境的投影。（本文曾收入賴澤涵、朱德蘭編：《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

⁵⁰ 巫永福：〈祖國〉，《夏潮》第3卷第1期（1977年7月），頁64。